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隋唐五代

巴蜀书社

译注 王松龄 杨立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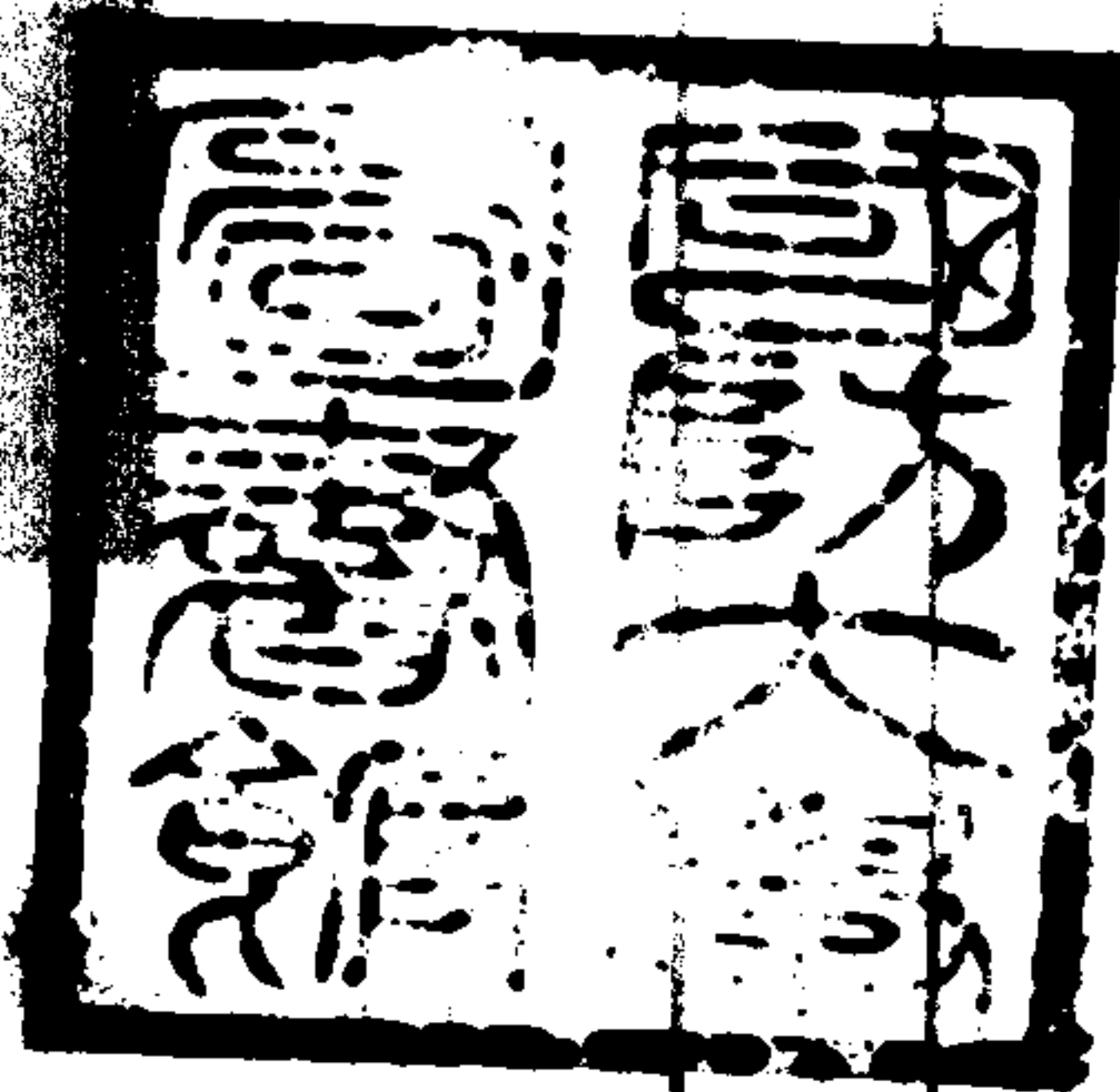
审阅 周勋初

柳宗元
诗文选译



2 031 0348 0

柳宗元诗文选译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秦伏男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 图：黎孟德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柳宗元诗文选译

王松龄 杨立扬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 8.625 字数 150 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00 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元 (第二批50种)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27/106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又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柳宗元（773—819）是我国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历来与韩愈齐名，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个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中唐政治舞台上短暂地扮演过重要角色。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郡（今山西永济）。柳氏原是河东著名门阀士族，柳宗元的高伯祖柳奭是唐高宗的宰相，后因得罪武则天被杀，从此柳氏地位一落千丈。柳宗元的曾祖父、祖父只做过县令，父亲和一个叔父通过科举入仕，地位也不高。由于世代在外做官，柳家早离祖籍，在首都长安有房产和庄园，连祖坟都迁到长安郊外。唐代宗大历八年（773），柳宗元出生在长安，并在那里渡过了大半

生，所以长安才是他真正的故乡。

柳宗元童年时由母亲卢氏教他读书，四岁时便熟读了古赋十四篇。十二、三岁时跟随在南方做官的父亲游历过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五年后又通过了严格的制科考试，随即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正式步入仕途。正字的官位很低，职责是校勘整理图书，但却有机会博览宫廷藏书，接触朝臣，被视为“清美”之职。三年任满之后，他被调为京兆府蓝田（今属陕西）县尉。按唐代惯例，没有任过地方职务的人不能为皇帝的“近侍官”。贞元十九年（803），他从蓝田县调回朝廷，任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805）王叔文当政，他被越级提升为正六品的礼部员外郎，时年三十三岁。从历官来看，他是沿着进士出身的人最理想的仕途升迁的。

柳宗元步入仕途之后，很快就以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才华崭露头角。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发议论、写文章总是旁征博引，意气风发，常常使对手折服，因而名噪一时，许多人都想与他交朋友，达官显贵也交口称誉，争着要把他罗致门下。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正在提倡古文运动的韩愈以及孟郊、李翱等著名文人建立了友谊；然而他的主要兴趣在

于从政而不是诗文，所以他与刘禹锡、吕温、韩泰、凌准、韩晔等志同道合的青年朝官过从更密，并结交了王叔文等重要政治人物，逐渐形成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柳宗元成了这个集团的骨干。

王叔文出身“微贱”，早年入侍东宫，陪唐德宗李适的太子李诵下棋，后来又陪太子读书，深得太子信任，是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德宗晚年昏庸贪婪、刚愎自用，朝政混乱腐败至极。李诵对其父的作为是不满的，王叔文便以他作为依靠，结纳人才，为一旦皇帝易位时刷新政治作准备。贞元二十一年（805，这年八月改元为永贞元年）正月，德宗病死，李诵即位（即顺宗），王叔文立刻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度支盐铁副使、户部侍郎等掌管财政的要职，实际上掌握了朝中大权。王叔文集团的另一代表人物王伾任翰林学士，柳宗元等人都被安排到重要职位上。接着他们迅速推行了一系列“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的革新措施（史称“永贞革新”）：惩办贪官污吏，剥夺某些官僚特权，起用过去被迫害的官员；收回被藩镇把持的财赋转运大权，断然拒绝蜀中军阀扩占土地的要求；打击宦官势力，禁止“宫市”，罢除侵渔百姓的“五坊小儿”，并策划派人夺取宦官掌握的兵权；取消地方官和节度使的额外“进奉”，豁免百姓积欠的赋

税五十二万余贯，大幅度降低专卖盐价；等等。这些措施直接触犯了宦官、藩镇和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进行反击，于八月四日迫使病势沉重的顺宗退位，拥立反对王叔文集团的太子李纯当皇帝（即宪宗）。李纯继位后，立即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王伾为开州司马，不久又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至此，当政一百多天的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被一网打尽，永贞革新烟消云散。柳宗元从政治权力的核心被抛了出来，在荒凉偏僻的南方开始了痛苦漫长的流贬生涯。在永州，他虽然有个司马的虚衔，但既无官舍又无职责，当了十年流放的囚徒。元和十年（815）他被召回长安，本有重新起用的希望，但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又立即被差派到更加僻远的柳州（治今广西柳州）去做刺史。一再的政治打击和严酷的贬谪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元和十四年（819），四十七岁的柳宗元病逝于柳州，过早地结束了悲剧的一生。

柳宗元和韩愈一样，是唐代古文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贬官之前，他虽然写过一些“奇句单行”

的“古文”，但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并不突出，比起当时已经在古文创作中卓有建树、明确提出了古文运动纲领并团结了一批同道的韩愈来，显然逊色；然而贬官之后，他得以把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古文创作和理论总结，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论文八书和《乞巧文》等文章中，他不但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反对“骈四俚六”的骈体文，而且对作家的品格修养、写作态度、艺术技巧和吸收古代文化遗产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并以此来指导向他求教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为丰富发展古文运动的理论和进一步推进古文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杰出的古文创作实践，更为古文运动的成功作出了千古不灭的贡献。韩愈在为柳宗元写的墓志铭中说：要是子厚贬斥的时间不长，穷困潦倒不到极点，那他可能在某些方面出人头地，但在文学辞章上一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像今天这样不朽的成就。可以这样说，后半生的贬谪虽是政治家柳宗元的不幸，却是文学家柳宗元的大幸。

柳宗元去世后，刘禹锡替他把遗稿编为《河东先生集》，收诗、文六百多篇。明代以后，他被尊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古文是与骈文对立的文体，它既包括属于文学范畴的散文，也包括不属

于文学范畴的理论著述和应用文章。以文学性散文的数量和成就而论，柳宗元在八大家中十分突出，和韩愈互相辉映。柳宗元文学性散文的样式和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杂文 作者文集今存四十五卷，“对”、“问答”、“说”、“吊赞箴戒”、“铭杂题”、“序”、“记”占十三卷，其中大部分是杂文。这类文章通常形制短小，有些作品还采用了讽刺笔法，故又有人称之为讽刺小品。

柳宗元杂文的题材十分广泛，上自关系国计民生、治乱兴亡的大事，下至个人见闻感慨、交友接物的琐事，无不纳入笔端。他以思想家的犀利目光解剖世态人生，以政治家的鲜明爱憎关心民苦，揭露社会弊端，写出大量见解独到、尖锐泼辣、具有明显现实针对性和强烈战斗性的作品，如《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永州龙兴寺息壤记》、《愚溪对》、《起废答》、《桐叶封弟辩》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这些文章写法灵活，姿态各异，或旁敲侧击，以小见大，或正话反说，幽默滑稽，或直言写意，激情喷涌，或托物寓愤，借题发挥。但不论采用何种写法，作者都注意叙事、议论、抒情的有机结合，都追求构思新颖，生动丰满，避免了杂文常见的枯燥肤廓的毛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杂文中讽刺手法的熟练运用，在以贬谪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里，作者善于以联想、引伸、夸张、类比、反语、调侃等方法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把仿佛信手拈来的题材组织成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和嘲弄，《愚溪对》、《起废答》等文即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类作品开拓了我国讽刺性杂文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鲁迅称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的晚唐讽刺小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对柳宗元的讽刺性杂文多所借鉴；而晚明小品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的作品，正是这个讽刺性杂文传统血脉相承的流裔。

（二）寓言 寓言在我国散文中“古已有之”，《庄子》、《孟子》等先秦散文就包含许多精彩的寓言，这些寓言是文章的组成部分，是作者论事说理的工具。柳宗元的部分散文（以及诗歌、辞赋）就采用了这种传统样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具有寓言色彩的散文；还有一些作品则不同，它们全篇仅仅陈说一个含义深远的寓言故事，以表达作者的某种劝谕和讽刺，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作品。这里所说的“寓言”就是指后一类。柳宗元是第一个较多地把前人当作论据使用的寓言扩展成独立作品、化零金碎玉为完璧的作家，在我国寓言文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

柳宗元的寓言可读性很强，历来拥有大量读者，有的作品甚至被概括为成语（如“黔驴技穷”）一直运用。如果把它们与先秦著名的寓言（如“狐假虎威”、“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相比较，就会发现它们的情节更加复杂完整、生动有趣，寓言形象更加绘声绘色、血肉丰满。如《黔驴说》里描写猎人玩弄技巧，吹竹诱鹿，不料引来猛兽，情急之下，他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吹竹招引更凶恶的猛兽，希图“以物制物”，结果一次又一次陷入愈加危急的境地，终于为黑所食。这个故事层层推进、波澜迭起，与先秦寓言用三言两语勾划故事轮廓很不相同。在《黔之驴》里，作者把老虎初见驴时惊恐的动作、神态和后来一步一步的心理变化描摹得细致传神，这与先秦寓言只对形象作粗略勾勒也明显不同。情节的完整和形象的丰满使柳宗元的寓言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它们之所以具有千百年的生命力，更在于其寓意的深刻和丰富。作者写这些寓言时寓意何在已难于确定。有的学者把柳宗元的寓言按主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病态的世风人情的讽刺批判，第二类是对当权的统治者的影射和攻击，抒发作者遭受政治迫害后的愤懑不平。这个分法简单明瞭，对读者不无助益，却失于

简单化。例如把《黑说》划入第一类，但《黑说》不仅讥讽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靠玩弄雕虫小技混日子的人，而且讥讽朝廷“以藩制藩”的失策，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划入哪一类都不妥当。即使是主题看起来比较明确的作品，人们也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的认识：《黔之驴》是讲外强中干者不堪一击？是讲大小强弱互相转化？还是讲无能者不可逞能？优秀的寓言不仅仅揭示深刻的哲理，而且其客观内容往往超过作者的主观寓意，能给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启迪。我们应以这样的眼光去阅读柳宗元的寓言。

（三）人物传记 柳宗元以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文章有七十余篇，大部分是应人请托而作的墓志、行状、碑传之类，其中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人物传记约有十来篇。这些成功之作大都取材于市井百姓或下层官吏，通过对他们言行遭际的描写，反映了中唐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和人民的悲惨生活，寄托着作者对朝政的见解和对世风人情的抨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传记独树一帜的写法，即传记的议论化、杂文化。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不顾传统传记那些相对固定的程式，对传主生平事迹不作全面详尽的叙写，而只突出传主的某一类言行和生活片断，然后放手借题发